

# 译者主体性的语言哲学反思

柳晓辉

(长沙理工大学, 长沙 410005)

**提 要:** 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语言转向之后, 语言的地位得到迅速提升。语言不再是人与人交流时所使用的透明工具, 而是变为一个特殊的在者。与之相伴, 西方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之后,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也在不断提升。本文从语言地位的变化入手, 试析两个转向之间的联系, 探讨译者作为特殊的语言活动参与者的地位与作用。

**关键词:** 语言本体论; 语言转向; 译者主体; 语言哲学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10)01 - 0122 - 4

## Reflection on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from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iu Xiao-hui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5, China)

After linguistic turn, language beca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the life world. Language is not only the tool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but also a special being. Along with it, cultural turn occurred in the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he translator got more attention. This thesis tries to analyse the change of language's position, discuss the translator's subject as a special participant in language activity, and finally provide some reference to the study of ontology of language.

**Key words:** ontology of language; linguistic turn; translator subjec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 1 引言

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语言转向 (linguistic turn)之后, 语言的地位迅速提升。“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 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在者”(李洪儒 2007: 11)。培根 (Bacon, F.) 曾经说过, “我们认为统治着自己的语词, 甚至较好地限制了它……但是在某种程度上, 语词就像鞑靼人的弓箭一样反作用于我们的理解, 甚至也许使我们困惑或是走入误区”(Bacon 1826: 141)。因此, 为了认识我们的世界, 就必须首先认识语言。与此同时, 西方翻译研究发生了文化转向 (cultural turn)。此后, 译者 (translator) 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译者作为连接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纽带而成为翻译研究关注的核心。本文从语言地位的变化入手, 尝试性分析两个转向之间的关系, 探讨译者作为一个特殊的语言活动参与者的地位与作用。须要指出, 这项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许多内容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展开、说透, 有

待于以后另文专论。

### 2 语言: 从工具到在者

“语言是什么, 与语言密切相关的人和人的世界如何在如何是呢? 迄今为止, 语言学的回答让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分析哲学的努力失败了; 日常语言哲学的研究让人看不到希望……”(李洪儒 2008b: 17) 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都在苦苦地探究语言的本质, 语言在人的世界中的地位也在随着研究的进步不断变化。

#### 2.1 语言工具论

语言地位的变化离不开西方哲学发展经历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搞本体论——直逼‘存在是什么? 世界的本质是什么?’——遇到了打不破的坚冰, 只好转向第二阶段——认识论 (人是怎样认识到存在的?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人的认识的来源、途径、能力、限制是什么?), 又遇到了麻烦解不开, 最后转到第三个阶段——语言论”。

(钱冠连 1999: 9)在本体论阶段,语言就犹如空气的存在一样,根本没有进入哲学家的视野。哲学家的视域还局限于外在物理世界,追逐世界的本原何在。于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语言工具论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其后,各个时期的思想家都对这种思想有很多论述。

持语言工具论的学者认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和其他动物分道扬镳的最后的、最重要的标志。索绪尔(Saussure, F.)指出,“语言是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只不过语言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Saussure 2001: 15)。萨丕尔(Sapir, E.)认为,“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Sapir 1921: 7)。霍凯特(Hockett, C.)告诉我们,“语言是人类持有的最宝贵的财富”(霍凯特 2002: 1)。杜威(Dewey, J.)将语言视为一种关系,指出,“语言是至少在两个人之间交相作用的一个方式,一个说话人和一个听话人;它要预先承认一个组织起来的群众,而这两个人是属于这个群体之内的,而且他们两人是从这个群体中获得他们的言语习惯的。所以它是一种关系”(钱冠连 2001: 2)。以上的这些观点都是将语言视为透明的、无条件为人类服务的工具,似乎语言在人与人之间只是一种纽带,只不过语言比其他的東西更重要一些。

正如莱昂斯(Lyons, J.)所说,“我们很难做到在给语言下定义的时候不提到交际”(Lyons 1977: 32)。事实上,语言绝不仅仅是人类交际的工具。语言工具论的局限性就在于将语言的功能视为语言本身,正如李洪儒所说,“暖水瓶可以保温,但保温并不是暖水瓶本身”(李洪儒 2008a: 123)。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逐渐认识到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传递人的思想,使人们之间能够相互交流,但这并不是语言的全部。于是,语言工具论就渐渐离开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 2.2 语言非工具论

进入认识论时期,哲学家关注对世界的认识问题,逐渐意识到语言对人类的重要程度,绝不仅仅是人类探究世界本原的工具。这时,语言开始渐渐成为“精神”和“文化”的代名词。威廉·洪堡特(Humboldt, W.)指出,“我们可以把语言看

作一种世界观,也可以把语言看作一种联系起思想的方式,实际上,语言在自身中把这两种作用统一了起来”(Humboldt 1988: 44)。

在语言论阶段,语言哲学家“关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梁瑞清 2008: 8),“通过语言分析、解释来揭示以语言为存在方式的人及人的世界”(李洪儒 2008a: 3)。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L.)将所有的哲学问题都归于哲学家对语言的误解,提出,“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Wittgenstein 1955: 149)。语言不存在普遍的本质,“只有在不同的具体语言游戏中,我们才能够描述或显现它的某些相似性”(严明 2009: 101)。哲学解释学认为,“人创造了语言,但人却从属于语言;人所创造的语言不是人的一种工具,而是人的存在方式”(李洪儒 2006: 32)。伽达默尔(Gadamer, H.)说,我们只能通过语言来理解世界,语言体现了人与世界的一切关系(Gadamer 1975: 236)。海德格尔(Heidegger, M.)强调,“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中”(海德格尔 2001: 366)。关于语言的洞见很多很多,不过,由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人从来不能没有语言而存在”(利科 2004: 194)。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人拥有语言,而是语词拥有人。语言也就自然地成为一种本体——在者是者(being)。

## 3 译者:从隐身到主体

由于翻译研究起源于对宗教文本的翻译,所以译者的作用一直被神的光辉所掩盖。例如,根据菲洛(Philo, J.)的记载,古希腊70子分别独立翻译《圣经》,但译出的70个版本竟然完全相同(谭载喜 1991: 28)。这种传说本身就体现出当时人们衡量译者的标准。近两千年来,译者的无形与隐身几乎成为毋庸置疑的必然。译者的终极目标就是成为原作与译作之间理想的透明导体,使意义像电流一样在没有电阻的导线中从原作流向译作。“五不翻”、“信达雅”等原则都是通过最大限度地限制译者的活动来追求不可能实现的、具有某种客观性的等值。

20世纪,西方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之后,文化等社会因素走进了译学研究的视野。翻译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语词或语句等语言微观层面上

的对应,转而关注语篇、社会和文化等宏观层面。德国翻译学者斯奈尔·霍恩比曾经指出,翻译应该注重研究“语词在文本语境、情景和文化情景构成的关系网”(Snell-Hornby 1995: 35)。这正体现出翻译这一特殊的言语活动的复杂性。每一个句子背后所隐含的内容都是复杂的,而这种繁杂的状况要依靠译者的拨茧抽丝式的解决。于是,关注的重心自然就转向了译者。

法国学者贝尔曼(Berman, A.)认为翻译批评应该以译者的主体地位为出发点,并且提出“走向译者”的口号。持目的论的学者认为,翻译是一种行为,同其他行为一样都有一定的目的。目的决定翻译活动的一切。操纵学派从文学翻译的角度出发,指出文学作品的翻译就是译者作出抉择和摆布文本的过程。女权主义者强调译者的存在,承认译者能占有和摆布原文的主导地位。以上的这些观点都体现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导地位。

简单地说,翻译就是指称关系在源语言与目的语之间的转移,其成功与否取决于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与运用。理想的译者应该根据翻译活动的目的,并结合自己对目的语和读者需求的理解去制定自己的翻译策略。一方面,译者必须考虑原作作为一个在者/是者客观存在的现实,应当根据翻译的目的,在不违反原作本意的基础上,利用自己的综合知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Won't you come? No, I won't

译文<sub>1</sub>:你不愿意来吗?不,我不愿意。

译文<sub>2</sub>:你不愿意来吗?是,我不愿意。

Doesn't she know English? Yes, she does

译文<sub>1</sub>:她不懂英语吗?是,她懂。

译文<sub>2</sub>:她不懂英语吗?不,她懂。

如果完全追随原文,那么译文<sub>1</sub>应当是正确的,但是它们显然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英美人在答问时用 Yes 或 No 完全取决于答话人本身言语行为的肯定性或否定性,而不是答话人对问话人陈述的赞同或否定。中国人则恰恰相反。又如, five years back 应当译为“五年以前”而不是“五年以后”等这样的翻译现象比比皆是。因此,类似误译的出现就是译者没有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没有利用自己的综合知识,忽略了两种语言表

达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译者主体性的作用也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以避免随心所欲的臆测。变译是可以的,但是要遵循作者初衷和作品的原意。此外,还有社会、文化因素对译者的规约。例如,“孔雀”(peacock)在汉语里是吉祥的象征,人们把孔雀开屏看成“大吉大利”;相应英语语词的意义主要属于贬义——人们将孔雀“骄傲”的一面视为关注焦点,从而构拟出“洋洋得意、自夸炫耀”的意义,如“似孔雀一般骄傲自大”(proud as a peacock),“年少轻狂的家伙”(the young peacock),等等。由此可见,正如文学翻译家所说,译者犹如戴着镣铐的舞者,既追求舞姿的优美,又时时刻刻受到羁绊,左右为难。

#### 4 语言哲学反思

意义是语言哲学和翻译研究共同关注的焦点。西方哲学语言转向之后,语言从工具上升为本体。作为语言使用者的人,在语言中的体现与存在更是与意义无法分离的。而译者作为翻译这一特殊言语活动的主导者,实现意义从源语到目的语的转移。因此,译文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译者的主观成分,打上译者的烙印。

伽达默尔曾经说过,“在对某一文本进行翻译的时候,无论译者如何努力进入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是设身处地把自己想象为作者,翻译都不可能纯粹是作者原始心理过程的重现,而是对文本的再创造,而这种再创造也是受到译者对文本内容理解的指导……不可怀疑的是,翻译涉及的是解释,而不只是重现”(Gadamer 1975: 347)。他认为,即使我们在翻译中追求“信”,但还是不免碰到模棱两可的情况。这时,译者就要作出选择,他“必须清楚地说明自己的理解”(Gadamer 1975: 348)。译者通常痛苦地发现自身与原文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时空距离,而又不能对自己还不清楚的东西予以保留,所以只能在反复的思考中寻找最佳的答案。就在这时候,译者随着答案的诞生而融入译文中。而翻译活动的复杂也正体现于语言与人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语言自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于‘人’的影响”(刘辉 2009: 23)。语言哲学的终极目标是研究人在语言中是如何是、如何在的。译者这一特殊的语言使用者正是这个问题的典型实例。从译者与原

作的视域相遇的那一刻起,交流、碰撞等活动相继展开,最终实现二者的“视域融合”。译者对原文的再创造正是人与语言合而为一的典型。“翻译不再是一种简单的语符转换的过程,翻译的实质即解释,是融入译者主观审美和历史情境的艺术创造行为,译者成为一个有自主意识的主体参加到翻译活动之中。”(朱献珑 屠国元 2009: 5)“语言就是人,人就是语言”的呼唤在翻译活动中因此得到完美的体现(李洪儒 2007: 11)。

## 5 结束语

翻译就是一个从理解到表达的动态过程,而这个过程的主宰就是译者。翻译研究追求意义上的等值,可是,当我们还无法确定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又何谈等值呢?整个译文的诞生都要依靠译者来实现,那又怎么能排除译者,也就是人的因素(human-factor)在译文中的作用呢?而这些问题恰恰也是语言哲学关注的重心,所以要依靠它的发展才有望得到解决。因此,语言哲学在作为语言学营养的来源的同时,也可以给翻译研究提供“养料”,进一步完善关于人如何在语言中存在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海德格尔. 路标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霍凯特. 现代语言学教程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李洪儒. 系词——人在语句中的存在家园 [J]. 外语学刊, 2006(2).  
 李洪儒. 意见命题意向谓词与命题的搭配 [J]. 外语学刊, 2007(4).  
 李洪儒. 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研究——站在流派的交

- 叉点上 [D].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博士后科研报告, 2008a  
 李洪儒. 西方语言哲学批判 [J]. 外语学刊, 2008b(6).  
 利科. 哲学主要趋向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梁瑞清. 语言地图说 [J]. 外语学刊, 2008(3).  
 刘辉. 索绪尔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继承与超越——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系列研究之一 [J]. 外语学刊, 2009(3).  
 钱冠连. 哲学轨道上的语言研究 [J]. 外国语, 1999(6).  
 钱冠连. 不当交际工具使用的语言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1(2).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  
 严明. 话语分析的基础:话语共同体 [J]. 外语学刊, 2009(4).  
 朱献珑 屠国元. 译者主体的缺失与回归 [J]. 外语教学, 2009(5).  
 Bacon, F. *De Dignita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 [M]. London: C. Baldwin Printer, 1826.  
 Gadamer, H. *Truth and Method* [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75.  
 Humboldt, W. *On Langu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Lyons, J. *Semantics* (Vol. I)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Sapir, E.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M]. New York: Harcourt, 1921.  
 Saussure, F.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Snell-Hornby, M.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M].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House, 1995.  
 Wittgenstein, L.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55.

收稿日期: 2009 - 11 - 27

【责任编辑 李洪儒】